

【经济与管理】

DOI: 10.15986/j.1008-7192.2017.05.007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冲突与解决

周恩毅, 王淑燕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安 陕西 710055)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党和政府从制度层面提出的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党和政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理性的价值取向。当今世界,最重要、最核心的命题之一是国家治理问题,政府、社会、市场的关系问题是国家治理体系中关键之所在,需要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整体性的系统功能。然而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现代国家治理理论及治理实践告诉我们,现代化出现了分裂:一是以理性与科学为核心,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追求治理的利益与效果最大化的工具理性;一是以公共利益为核心,强调治理的公正、动机的纯正与手段的正确性的价值理性。在行政实践中,工具理性抑制着价值理性功能的发挥。因此,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以工具理性为优先前提的同时,也应将价值理性作为实现现代化治理的保障,致力于解决二者在现代化治理进程中的冲突,从各领域、各维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冲突与解决

中图分类号:B 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17)05-0038-07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代化的治理理念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理解和研究。俞可平从内涵本质、必然要求、必要举措三个方面来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1]。刘俊杰认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从密切相关的社会矛盾出发,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的核心问题^[2]。许耀桐,刘祺认为必须在科学治理、民主治理、制度治理、中国特色原则四个原则,树牢目标理念、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制度建设、推进各项改革、夯实社会基础五条路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3]。辛向阳认为要以定型和强体为主线,以统筹和协调重大关系为前提,以法治和核心价值观为依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4]。魏治勋以“善治”为准则推

进国家新阶段改革顶层设计的规划,对国家治理制度体制和功能机制进行根本性变革阐释国家治理现代化^[5]。以上学者都是从不同的维度来理解治理现代化的,各有自己的侧重点和理解,对治理现代化给出了理论诠释。当前,我国处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信息技术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有了新的需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治理现代化主张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人们主动关心、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与此同时也强调对经济发展的价值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以工具理性为优先前提,价值理性为保障,正确处理好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解决二者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冲突,实现二者的融合统一。

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治理,字面意思是统治、管理。治理一词来

收稿日期:2017-03-15

基金项目:西安市2017年社科基金“大数据时代西安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研究”(17J36)

作者简介:周恩毅(1963-),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府治理;王淑燕(1990-),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地方政府治理理论与实践。E-mail:1577197796@qq.com

源于拉丁文 (kybernets) 和古希腊语 (kybenan), 意为引导、控制和操纵。“治理”一词的使用最早见于1989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 当时使用的是“治理危机” (governance crisis)^[6]。此后, 治理在政府研究领域中被广泛使用。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 也不是一种活动, 而是一个过程; 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 而是协调; 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 也包括私人部门; 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 而是持续的活动^[7]。目前, 我国国家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的治理。俞可平认为, 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 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三个基本问题: 谁治理, 如何治理, 治理得怎样^[8]。魏治勋认为,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其核心要旨在于以现代治理理念重构公共权力, 实现国家治理的范式转换, 中心内容则是行政体系的自我再造, 直接目标则是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打造民主、法治、高效的现代行政体系, 为国家的“善治”创造条件。鉴于政府治理的中心地位,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以“政府再造”和政府治理能力质的提升为主要内容和基本目标^{[5]35}。魏晓文认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就是使国家治理实现多元参与和协商共治使构成要素及其结构关系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在各个领域的权力配置、利益协调、职能界定更加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明晰化从而把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国家治理效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辅相成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整体^[9]。我们要立足当下, 着眼于现代化, 要汲取西方治理理论中对我国治理现代化有益的思想, 结合本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治理研究内容, 将政府、社会、市场三者有效整合, 形成一套有效的整合机制和制度设计, 结合国情从实际出发,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现代化”框架。

习近平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中指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的安排, 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 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全新维度, 要求我们通过上层建筑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做适应性调整, 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 加快生产力步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0]41} 据此, 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 我们要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整体性的系统功能, 在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国家现代化治理的价值目标, 需要一定的方式和手段, 即工具手段和价值手段。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提出“合理性”概念, 将其表述为“工具的合理性与价值的合理性”, 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 就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 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 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1]17}。也可以理解为: 通过严密的计算方法得出最大功利, 以实践的方式确认所采取工具 (手段) 的效用, 为主体的某种利益的实现服务。强调的是结果和效果的最大化。价值理性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价值及其追求的自觉意识, 是在理性认知基础上对价值及价值追求的自觉理解和把握^{[11]18}。价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价值, 强调终极关怀, 主张通过美的、善的手段来探求真理, 发展科学, 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但不可以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是没有结合点完全相背离的。相反, 二者互为根据, 相辅相成。首先, 工具理性的存在需要价值理性为其提供精神动力。客观存在着的自然界有无穷的奥秘需要我们去探索, 人类的实践活动规律也在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 对无穷的自然界的

探索与认知,对规律的掌握,都需要人积极发挥其主体性的作用,发展科技,提高工具手段的应用。其次,价值理性的实现需要工具理性提供现实支撑。工具理性要求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自然,体现了主体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为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人们依靠工具理性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通过对自我的认识加深实现价值理性的升华。最后,二者不能相互等同,互相替代。价值理性引导主体“做什么”,它的价值行为是无条件的,而工具理性则教导主体“怎样做”,其行为受追求的功利的动机的驱使。在实践中,人们进行的是有目的的活动,主体需要依靠价值理性认识世界,更需要通过工具手段来改变世界。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发展取向

改革开放至今,社会各方面发展卓越,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五位一体”建设有序推进,在国际社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由于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健全、不完善,伴随着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比如教育公平问题、医疗改革问题、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利益冲突问题等。可见,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存在着诸多严峻的挑战。其一,民主决策机制的缺失。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2]1678}现代化与民主化是相辅相佐、互相依存的,如果不讲民主,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治理。其二,社会中的不公平,诸如分配不公、政府投入不均衡、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等问题日益凸显,贫富差距愈演愈烈。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人类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任何妨碍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制度、程序,都应当加以改革,社会主义更应如此。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必须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创造有利的条件和保障^{[13]18}。其三,政府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治理理念陈旧,缺乏创新。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政府在各个领域充

当着全能者的角色,政企、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并没有给社会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因此,国家治理尤其在行政领域中必须做到高效治理,重新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使之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综合上述问题,对于当前的国家治理而言,因其公共事务繁杂、利益主体多元、公众需求多样、社会阶层分化、治理观念陈旧,使得国家治理的难度系数不断增大,迫切需要新的治理模式助力变革。当今世界,最重要、最核心的命题之一是国家治理问题,政府、社会、市场的关系问题是国家治理体系中关键之所在。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应该有较高的政府治理能力,合理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的边界,各司其职,多元治理。“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互动,以及政府内部各层级治理主体之间的职责权限的分工共同构成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成长的两条主线”^{[14]166}。不可否认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主要地位,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要立足“国家—社会—市场”的三分结构,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建构符合国情的国家治理体制机制,形成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多元治理格局。当前国家治理处于现代化转型阶段,我们需要改变传统的政府治理体制机制,以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基点在于统筹和协调处理好与国家治理相关的各种重大关系。也就是说,要在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建立现代化的社会基础、建构社会利益关联,解决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市场治理之间的关系断裂问题。“社会、市场与政府三大治理主体间两两成对的互动过程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架构”^[15],三大治理主体的关键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之所在,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问题之所在。这就要求我们:明晰产权制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现代

化道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基于顶层设计的现实需求提出的国家重大战略目标,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国家现代化的内涵。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势必要求在国家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重要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16]。只有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置于深化改革总目标的位置上,才能使之成为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社会公平、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自我完善和发展,实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在于是否能达到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遵循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运用法治思维和逻辑体系治理国家,使社会大众积极参与其中,最终达到政府、社会、市场三者良性互动的治理效果,实现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的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其核心要旨在于以现代治理理念重构公共权力,实现国家治理的范式转换,中心内容则是行政体系的自我再造,直接目标则是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打造民主、法治、高效的现代行政体系,为国家的“善治”创造条件^[5]。中国作为现代化国家的后起之秀,在国家治理模式的价值选择上有着内在逻辑,通过不断探索,找到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国家治理之路。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价值难题——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

19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并且渗入社会的各个领域,人们谈理性,就不能不涉及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了理性的代名词,传统的启蒙理性逐渐嬗变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17]。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相伴随的工具理性的迅速崛起,侵蚀着价值理性的

发展空间,甚至湮没着价值理性。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曾由于过分强调工具理性带来的功利性而忽略了价值理性的规范性,引起了政治体制、利益结构、社会观念的变革,从而凸显了国家治理的价值分裂与冲突。

第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之间的矛盾。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不公平问题日益显现。从实质上看,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将追求经济增长作为中心任务,注重效率,忽视公平。“当效率的衡量成为唯一的讨论议题的时候,协商的、沟通的以及参与的功能都将失去它们的重要性。”^{[18]26}鉴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由发展生产力和竞争力组成的经济发展,成了国家发展优先考虑的目标,以投资和出口为主要拉动力,以经济增长作为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因为工具理性效能的发挥能提高劳动效率,增长经济发展体,并且使财富迅速增加,导致了过于注重经济发展指数而忽视公平的问题。在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社会的不公平、利益冲突等问题都随之而来。

第二,权威与民主的矛盾。当国家治理陷入对技术与工具(手段)的追求时,效率必然居于核心地位,民主、正义、自由等将没有实际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在以理性官僚制组织为行动的国家治理中,行政人员的责任完全被寄托于技术化的设计中,而不是基于公共性^[19]。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工具理性的膨胀名正言顺。在治理过程中,夸大了政府在治理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在决策过程中,以领导人的主观意志为决策基点,有的甚至变质为个人独断专权,导致了责任与价值的分离。过度地强调政府的作用、过强的权威主义压制了市民社会的发展,限制了公民对自由权利和广泛政治参与的向往^[19]。

第三,个人主义与公共精神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生产和生活中,工具理性日益占据了人类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价值理性则日益被边缘化^[20]。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发展以市场经济为轴心,公共主义的社会逐步被

个人主义的社会所充斥。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演变为一种物化的关系,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将自我利益最大化作为首要交往的前提。通常以自我为自然的中心,忽视了情感的沟通与交流,将个人利益置于他人与社会团体利益之上,导致个人与他人、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常常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甚至产生冲突。“个人主义一方面执着于原子式的独立自我,另一方面又将利益追逐看作个人的自然本性和正当权利”、“对于以自我为轴心的个人主义来说,一种客观、普适的公共道德标准是很难成立的”^[21]。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价值目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

工业革命在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产生了大量的工业聚集,影响了人类之间的关系。受西方工具理性下社会变革与中国本土价值理性下发展滞后的双重影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国家治理进程中产生了冲突。然而究其本质,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工具理性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价值理性则保障社会文明和谐与进步;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提供物质基础,价值理性则是工具理性的精神支撑。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重新融合是人类社会发展合理性的内在要求,我们迫切需要通过两者的融合,处理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类危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不仅仅是一个通过增进治理活动的科学性、有效性与合理性来寻求丰富的资源积累的过程,也是在“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中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不断克服社会失序、重构社会秩序与规范价值体系,从而确保国家政治权威合法性的进程^[19]。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变革社会治理,创新治理体制机制,使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趋于成功,取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融合统一。

第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价值理性的重塑。“每次理性认识活动之前,都有一个评价的情感活动。因为只有注意到对象的价值,对象才表现为值得研究和有意义的东西。”^[22]⁸价值理性是理性和价值的交融。“理性与价值亦有各自侧重的一面。

如果说,理性的探索更直接地指向求真的过程,那么价值的关怀则较多地关联着向善的过程。”^[23]²中国国家治理视域下的价值理性即作为核心的政府,在治理实践中形成的对价值及其价值实现手段是否正确合理的自觉追求,是在理性认识基础上对价值追求的自觉理解和把握,它强调的是:社会发展要以人民的根本需要为起始点,以民生为落脚点,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将关注点落实在社会公平与正义上,突出强调整个治理体系对社会的 service 功能和服务精神;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承担起现代政府的责任,发挥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的内核作用。正如普朗克所言:“科学提高了生命的道德价值,因为它促进了对真理的爱,以及敬重——对真理之爱表现在一种持续不断的努力之中,即努力要达到对我们周围的心与物的世界更确切的认识,至于促进了敬重之情,乃是因为认识的每一进展,都使我们面对了我们自己存在之神秘。”^[24]¹⁵⁹因此,必须重塑价值理性的内核,使其符合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第二,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工具理性的归位。工具理性体现了主体对思维客体规律性的认知和驾驭,由此逐渐形成的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等,则构成人类文明的积淀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21]³⁷。工具理性对人类的益处显而易见,然而伴随着工具理性在社会范围内的张扬与越位,其在国家治理领域内也有绝对化的倾向,成为在治理现代化中发挥实际与主导作用的理性。“譬如对待人生理想、宗教信仰、情感、道德、审美、价值判断等等,仅借助于自然科学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定量分析和逻辑推演与判断,显然是不够的、难以把握的。心理现象和感情世界,用某种某几种自然科学方法进行解释并加以规范是比较困难的。”^[25]因此,我们应该以工具理性为基石,制定科学严密、合乎人性的规范和治理制度,并且将伦理和道德的因素渗入其中,加强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与执行的合理性,使其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形成良好的国家治理运行机制。工具理性自身价值的实现,体现了主体对客体规律的认识、运用、驾驭的过程,以及由

此不断形成的各种科学,并且发展成为人类文明的积淀^[26]。这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融合统一的关键。

第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制化与道德化——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调适整合的途径。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融合统一和依存的母体。人类就是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不断地破裂、融合的循环、盘旋上升中向前发展的。国家治理作为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不同于封建集权的专制统治治理,它是对盲目追求片面科学化与技术化的治理的超越。这就要求在符合公共性要求的前提下,通过有效率的安排与设计,运用法治与道德、制度化与人性化、效率与程序、协商与互律相统一的方式来共同治理。工具理性的不断深化使得价值理性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状态再到自由状态的现实展开成为可能^[20]。在治理过程中必须反映人民大众的利益诉求,充分发挥公共行政主体的道德主动性,实现高效地服务公众,维护公共利益。国家治理是法律与伦理道德共存的,其治理过程中强调法制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凸显道德伦理的作用。面对政府、社会以及个体行为、社会问题、群众利益关系等,法制和制度是外在的规范,而伦理道德是内在的要求,更具有根本性、基础性和长远性。要在严格遵守法律规章制度的前提下,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提倡社会公德,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构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总之,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是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设规创制的过程,也是协调和平衡效率与公平、权威与民主、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过程。我们务必要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前提,从各领域、各维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中国政府治理的转型期与上升期中,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既有对工具理性亟须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有整体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趋向。只有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

性融合在一起作为国家治理的价值诉求,才能实现社会、国家与人的和谐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前线,2014(1):5-8,13.
- [2] 刘俊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问题[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4(1):5-8.
- [3] 许耀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若干认识[J].民主与科学,2014(2):6-8.
- [4] 辛向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大路径[J].江西社会科学,2014(2):5-9.
- [5] 魏治勋.“善治”视野中的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J].法学论坛,2014(2):32-45.
- [6] 杜飞进.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全新维度——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社会科学研究,2014(5):37-53.
- [7] 苏光.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诉求——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J].理论探讨,2014(3):24-26.
- [8] 俞可平.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本质[J].理论导报,2014(4):15-16.
- [9] 魏晓文.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相互促进[J].政治研究,2014(2):25-28.
- [10]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11]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1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3] 陈光中.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标准之我见[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5):17-19.
- [14] 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 [15] 胡宁生.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府、市场和社会新型协同互动[J].南京社会科学,2014(1):80-86,106.
- [16] 赵金兰.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J].理论观察,2015(1):15-17.
- [17] 张永青,李允华.浅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野与整合[J].东南大学学报,2008(10):39-41.
- [18] 吉瑞赛特.公共组织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演进[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 [19] 张雅勤. 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基于现代性分化与融合的视角[J]. 中国行政管理, 2015(10): 52-58.
- [20] 刘科, 李东晓.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从历史分离到现实整合[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6): 37-40.
- [21] 张凤阳. 个性自由的合理限度[J]. 江苏社会科学, 1999(3): 86-91.
- [22] 拉普. 技术哲学导论[M].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 [23] 杨国荣. 理性与价值[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24] 刘大椿. 在真与善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25] 任雪萍. 科学理性及其双重效应[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6): 27-31.
- [26] 朱丽霞. 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融合途径探析[J]. 江汉论坛, 2009(1): 31-34.

The Conflicts and Resolution of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the Value Rationality in Stat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ZHOU En-yi, WANG Shu-yan

(School of Marxism, Xi'an Univ. of Arch. and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requires that we should deepen the reform comprehensively and advance the modernization in the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 which is the objective to construct the modernization on the instrumental level put forward by CPC and the government, and also the rational value orientation of both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oday's world,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ropositions is the state govern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ociety and market is the key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give a full play of the whole system function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governance capabil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ociety, however, the moder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has presented some discrepancy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peruses the maximization of interests and effect of governance, takes the rationality and science as the guideline and advocates the tools worship and technicism for survive. On the contrary, the value rationality takes the public interests as the core, emphasizing the fairness of governance, the purity of motivation and the correctness of method. In the administration practice,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ends to restrict the functioning of the value rationality. Therefore,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 we should also regard the value rationality as the guarantee of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even if giving priority to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t is important to resolv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m when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 in every field and in each dimension.

Key words: stat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ool worship; value rationality; conflict and resolution

【编辑 吴晓利】